

## “务在鞠躬”——析论《史记·万石张叔列传》的庸宦形象

叶建勇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摘要

司马迁于李陵之祸中仗义执言而身遭极刑，当时朝廷上下“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故其对《万石张叔列传》中诸如石奋等仰君主鼻息而活的庸宦，只知道恭谨维诺当官，然对大是大非却知而不言的行为深有所感，故其以赞美的笔调，实则隐含讥讽之笔刺，来撰写这篇列传。

**关键词：**史记、庸宦、恭谨、鞠躬

## **An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Images of Wan Dan Zhang Shu Biography in Shiji**

YAP Kien Y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ew Era College.

### **Abstract**

After Li Ling's misfortune, Sima Qian spoke up to fight for justice and later he was sentenced to castration. Nobody offered help to Sima Qian or tried to convince the emperor at the time. Sima Qian could not agree with those boot-licker officials who practiced obedience to authority blindly and ignored the facts that could be harsh to the ear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over how Sima Qian expressed his dissatisfaction and anger to the feudal hegemony by making extensive use of irony, sarcasm in writing this biography named Wan Dan Zhang Shu.

**Keywords:** Shiji, Mediocre and incompetent official, submissiveness, bow

## 一、前言

太史公司马迁于《报任少卿书》中提及自身因向汉武帝阐明李陵之降匈奴，实力战至一兵一卒，是万不得已而降，故“其所催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以堵朝中的“睚眦之辞”。然而武帝“明主不深晓，以为朴沮贰师”，故下罪于自己。司马迁因仗义执言而身陷囹圄，且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而身受极刑，又因要继承史家遗志完成《史记》，因此徘徊在欲死而不能的边缘，内心极度挣扎痛苦。在身受其害的心理状态下，司马迁对平时阿谀奉承，对同僚落井下石的佞臣固然深恶痛觉，同时于那些深明“为官之道”，对主上察言观色却知而不言的人，相信亦深耻其行。《史记》第四十三篇列传《万石张叔列传》，就是为后者这种深懂官场生存规则的官僚所立之传，本文以“庸宦”二字将之概括。<sup>1</sup>

司马迁以“纳于言，敏于行”来形容〈万石张叔列传〉的庸宦。“纳于言，敏于行”本出自孔子之语，意思为规劝君子谨慎言语，因祸从口出，言语不谨慎或会害人害己，带来麻烦或是灾祸，故君子应谨慎言语而勤于做事。此言用于今日，则近似“少说话，多做事”之义。然而，《万石张叔列传》中所谓的“纳于言，敏于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观《太史公自序》之“叙目”部份，其谓：

敦厚慈孝，纳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骃集解，1982，页3316）

纳于言敏于行的最终目的，乃在于“务在鞠躬”。鞠躬者，《仪礼·聘礼》谓“执圭，入门，鞠躬焉，如恐失之。”；《汉书·冯奉世传赞》谓“宜乡侯叁鞠躬履方，择地而行，可谓淑人君子。”颜师古注曰：“鞠躬，谨敬貌。”（〔汉〕班固，1962，页3308）可见“鞠躬”一词是带有且敬且谨，惶恐有失之貌。司马迁在“敦厚慈孝，纳于言，敏于行”之后加上“务在鞠躬，君子长者”，读起来似有暗讽“为官之道，务在鞠躬；成君子长者，故须敦厚慈孝，纳于言敏于行”之义，所谓“敏于行”即“敏于鞠躬”。

司马迁在《万石张叔列传》的“叙目”处破题，谓一些仕宦为了成为君子长者，故以敦厚慈孝为修饰，纳于言语，敏于行动，而此行动即是对上位者“务在鞠躬”的为官之道。这些深懂为官之道者，除了对皇帝察言观色，毕恭毕敬之外，胸中实无真才实学。司马迁在传中对此等庸宦运用了讽刺的手法进行批判。本文旨趣，在于分析传文中每个庸宦的“务在鞠躬”处，从而探讨司马迁于文中各处运用的讽刺之笔，及其为这些庸宦立传所蕴含的褒贬之意。

<sup>1</sup> 庸者，平庸也，用于官吏在官场上的行为亦可诠释为扭曲的“中庸”，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宗旨是此类庸宦的为官之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庸宦不思进取，对上级唯命是从，不管世道何如只管自身的修为。见李法宝、米万英、洪润泽，《官吏、官制、官文化及历史走向》，页28。

## 二、三石之形象分析

### (一) 石奋

《万石张叔列传》虽以七人合传，然其骨干实在于万石君石奋及其二子石建及石庆父子三人身上，其余卫绾塞侯周仁张欧等，皆以其类似而合传，以达渲染烘托的效果。故本文以石奋三父子为一章，余人另立一章，以别其主副。

石奋者，汉高祖东击项籍时年十五，以其姐为高祖妃嫔之关系，官拜中涓，受书谒，后于孝文帝之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石奋为人并无实学，之所以能够积功劳而晋升，大多是靠其“恭谨无比”的为官态度。石奋及其四子，皆因孝谨而官至二千石，景帝谓其石氏一家“人臣尊宠乃集其一门”，故号其为万石君。石奋为人之恭谨，表现在几个小细节上，如：

孝景帝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64）

汉景帝末年，石奋告老归家，但仍食俸禄二千石，<sup>2</sup>于年关节日时，尚以朝臣的身份参加朝贺。<sup>3</sup>他在赴会朝贺之时，经过皇宫的宫门，必定下车步行；他于车上看见皇帝所承用之马，也要把身体俯在轼上表示恭敬。<sup>4</sup>石奋当时已是退休的旧臣，虽说臣下仍应对主上毕恭毕敬，然以车过宫门阙而下车步行，已是有点过度，其在看见皇帝御用之马时，竟还附在车前的横木上以示敬意，这未免恭谨太过而至于矫情了。

若说石奋在宫中时所展现的矫情，乃在于谨遵宫中礼仪，是情有可原的话，观其于家中的作息状态及对待小辈的态度，则实在是符合了本文所指的庸宦的“务在鞠躬”：

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座，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64）

<sup>2</sup> 沈钦韩谓汉无上大夫，通（一般）以中大夫二千石（按：即光禄大夫）者当之。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台北，里仁书局，1992年，页391。

<sup>3</sup> 此乃特殊礼遇，冈白驹谓外戚、皇室、诸侯才能享有此礼遇，汉时称之为“奉朝请”，石奋乃与皇室宗族结以姻亲，故有此待遇。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页391-392。

<sup>4</sup> 路马，即辂马，路通辂，谓皇帝所乘之马；式通轼，即车前之横木，作动词用。孔颖达《尚书正义》谓“式者，车上之横木。男子立乘（古人乘车，乃立于车上），有所敬，则俯而凭式（把身体俯在轼上表示敬意）。遂以式为敬名。”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页392。

每当在朝中担任较小官职的子孙归家探望自己时，石奋并不以家中长辈的身份与他们相处，而是以朝中更高官职的身份来接见子孙们，而且身穿朝服，更甚者不以名字直接称呼他们。子孙们如有过失，石奋也不责问，只是不居正坐，<sup>5</sup>对着盘案不食，以示自己之不快。然后家中其他子孙就会相继责难犯错的人，之后通过家中较年老的长辈求情，犯错的人袒露上身谢罪，承认悔改，石奋方才应允。家中无外人，何必惶恐得像在皇宫中那样谨守礼节呢？是想要以此博得外界对其家风的赞赏？又或是以此训练家中子孙，使子孙皆习得如他般恭谨，以便官场中继续逢源，步步高升？如此“鞠躬”处，还有更甚者：

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童仆欣欣如也，唯谨。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亦如之。（〔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64）

石奋在家闲暇之时，只要有成年的子孙在左右，必定戴上冠帽，显得非常严肃的样子。如此严谨的家风，使得奴仆亦端庄严肃，以谨慎恭敬为先。当皇帝赐食之时，此情况更是变本加厉。石奋在食用御赐的食物时，亦叩首匍匐而食，仿如在皇帝面前一样。恭谨本是美德，但若太过的话，就变得矫揉造作了。

若说石奋之严谨乃因其出身寒微，而其胸无半点墨水，则强作恭谨乃成全己身的为官之道，实乃情有可原，然其强要子孙遵从其“务在鞠躬”之道，则开了后世歪风。如石奋在治丧之时哀戚甚悼，子孙亦如此。然而子孙实乃遵照石奋意愿，并非出自真心，故此矫揉造作的家风，亦代代传承下去，以致后代除了矫情之外，更多了几许“虚伪狡诈”而近乎佞臣。

《万石张叔列传》的骨干在于石奋三父子身上，而石奋又是首开矫情之风者，以致后代越走越歪近乎佞。举凡事故必寻其源头，故读此篇列传，必要以石奋种种矫揉造作的行为，来观全篇主题之所在。

## （二）石建

石建者，万石君之长子，官拜郎中令。他的事迹有二，一为家中之事，一为朝中之事。家中者，其文如下：

建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旃，身自浣涤，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以为常。……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岁余，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65-2766）

<sup>5</sup> 便坐，别于正坐。石奋乃一家之长，理应居正坐，不居正坐，表示子孙对他不尊敬；案，指古人进餐时摆放肴饌之矮脚几。对着案盘不食，亦表示其之不愉快。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页392。

石建官拜郎中令，每五日得有休假，故归家谒亲。他每次都会先到下人的房舍去窃问父亲近况，然后把父亲的贴身衣物拿到侧室边亲自洗涤，再交予侍者。石建常这样做，却不敢让石奋知悉，可见其孝道若此。至石奋去世，石建哀恸悲哭，以致扶杖才能行走，一年余之后亦跟着去世。

石建是否表里如一，当真如文中所谓“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他是否真的哀伤太过至死？司马迁如此记载是感其至孝焉？传文虽无明白交代，但观石建在官场中的虚伪态度来看，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他的种种孝行，都只是一种门面功夫：

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骃集解，1982，页2765-2766）

为人臣者，应当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石建的为官之道，除了继承其父亲石奋之过度恭谨之外，更多了份近似佞臣般对人主察言观色的能力。石建为官，若有事需奏上，则会在没有旁人之时，恣意畅言至极切；然而在朝会时，却装聋作哑成不善言语者。若说其父石奋的恭谨是矫情的话，那么石建就是矫诈了。再看其恭谨处，当奏书上的字体“马”，其下连其尾巴共五点，然而石建将之写成四点，亦惶恐直呼“上谴死矣”，可见其“务在鞠躬”处，颇有超越乃父之风。

### （三）石庆

石庆者，石奋之幼子，官拜内史，尔后晋升为太子太傅，更至丞相，乃石家一门官爵至高者。石庆早年乃石奋诸子中最单纯的一个，观其肉袒谢罪之事可略窥一二：

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弟入里门，趋至家。（〔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骃集解，1982，页2766）

此处可看出石庆原本的单纯及不拘小节。虽说车至闾里而不下，于当时之礼节或有亏损。然从另一面来看，实可看出石庆未如其父兄般，矫揉造作乃至谄诈，至少他任其性而自然。然而，因为此事他受父亲石奋责难过度，进而“庆及诸子弟入里门，趋至家”。可见这件事，在他为人（官）处世的行为上，或多或少造成了影响乃至日后官拜丞相，亦知谨慎而已却无所进言。石庆的事迹，我们可以在下一则记文中，窥见他的改变：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67）

在石庆担任九卿的太仆之时，为皇帝驾车外出。皇帝问其驾车之马共有几匹。石庆用马鞭一一点数之后，举手回答：“六匹”。石庆身为掌管皇帝御驾的太仆，且为皇帝驾车外出，怎会不清楚马共有几匹呢？故以马鞭数之而回答，均是多此一举的动作，纯粹为了表现恭谨之态，故意为之。石庆本为石庆诸子中最为单纯自然者，然或许受其父之“教化”，致亦如此矫揉造作。如此“务在鞠躬”处还有更甚者，如：

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上以为丞相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丞相慙不任职，乃上书曰：“庆幸得待罪丞相，罢驾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天子曰：“仓廩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以书让庆，庆甚慙，遂复视事。（〔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68）

据《汉书》记载，“君欲安归难乎”之后尚有一句“君其反室”（〔汉〕班固，1962，页2198），意谓要石庆趁早回家，说的是反话。石庆鲁钝，未有察觉，尚喜滋滋以为皇帝批准自己告老回家，故欲呈上自己的侯印。然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注释指石庆丞相府的秘书谓此乃皇帝“责之深”，是反话，意思是要石庆引以自决，故庆觉得很惶恐而“遂复视事”。这里是司马迁深刻的讽刺之笔，让石庆这种患得患失的表情跃然纸上，同时亦侧面写出当时的朝廷氛围，君臣之间的猜防心理，<sup>6</sup>以及臣下心中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恐惧感。

在石庆当丞相期间，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汉军南征北伐，武帝好大喜功而劳民伤财，臣子如桑弘羊、王温舒、儿宽等以不同管道升迁九卿之列而丞相不必过问，如文中：

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儿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67）

<sup>6</sup> 一人专制政治，是秦国（汉廷继承）长期在法家思想培育下所形成。法家思想特点之一，是君臣关系的紧张，因而在心理上所引起的非常尖锐地猜防作用。一人专制者的皇帝地位，并不借助于神权，而主要是运用法术的钳制与威吓；这便更助长了法家所提出的君臣间的紧张关系和猜防心理。见徐复观，《秦汉中古史研究论集》，页25。

此处可看出石庆在任职丞相期间，一直唯唯诺诺仅知“醇谨”的形象，不论外交内政、经济司法等各方面，都不需要通过丞相的决定。把话说得俗一点，他就像个花瓶，摆着好看。然而，石庆也有想要做点什么的时候，如一度欲治武帝近臣，却不成功而反受其罪。<sup>7</sup>如此看来，石庆的严谨不如其父石奋，察言观色不如其兄石建。不管他欲治近臣是否出自真心或只是门面功夫，但他毕竟是“多”做了，而且也做得不合时宜。因此，武帝之后于“流民事件”会对其严厉呵责，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依石庆早时的单纯作风，其性格本不适合朝廷中的为官之道。然其父石奋硬要将之改造成与其一模一样的形象，可见石庆是毁在这种“务在鞠躬”的家风里了。

观万石君三父子之形象，其家风始于石奋之恭谨。这或许因为石奋出身寒微，且缺乏真才实学，故其为官之道除了恭谨之外则别无他法。然而石奋的恭谨却过度而变成了矫揉造作，他不只在朝中将这股虚假之风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在家中亦为难了一群子孙。因此，石家的子孙在遵从家主的意愿后，有的愈发虚伪，懂得察言观色，以至于相近如佞臣者般谄诈，如石建者如是；或是为遵从父意而努力压抑自身本性，以致迷失自己于宦海之中，如石庆者如是。因此万石君三父子之以一个“谨”字为官，然谨之太过而近乎虚假，其“务在鞠躬”的源头实来自于石奋本身。因此读《万石张叔列传》的三石之处，应着眼于石奋之恭谨对其后代的影响处。

### 三、余人之形象分析

#### （一）卫绾

卫绾者，因能在车上表演杂技而侍卫孝文帝的郎官。后来因积累功劳升迁为郎中郎将。后又拜至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更至丞相。从一车士而跃之龙门至位极人臣，可说是官场的典范。然观司马迁为其下的评语却只有“醇谨无他”。卫绾在文帝之时甚得宠，当景帝还是太子之时，曾宴请文帝左右之人，唯独卫绾称病不行。之后景帝当位，问其因：

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不自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实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剑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

<sup>7</sup> 从另一面来看，石庆在任职丞相期间的唯唯诺诺或许才是生存之道，反而励精图治才是皇帝的忌讳，毕竟丞相的职权与封建皇权的专制政治相抵触，如徐复观所言：“文、景、武三世，正汉室盛时；独对丞相及副丞相的御史大夫，中间除张苍明律历外，皆特选无能之辈。盖专制主的内心，欲以无能者特别恩遇的感激，换取此种职位者的忠诚；并以无能来抵消、抑制此一重大职位所能发生的作用，籍得减轻内心的疑忌。”见徐复观，《秦汉中古史研究论集》，页31。



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尚盛，未尝服也。（〔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69）

在这次简短的对话中，可得知卫绾实深懂官场的生存之道，甚或说是深懂揣度主子的心意。景帝问卫绾是否知道何以能够与皇帝参乘，卫绾不去猜度皇帝的心意，而是表以自身之升迁实庸庸碌碌不得而知。此种回答最得君心，盖君王皆善猜忌，庸碌之官最得其心，卫绾在一开始的应答中已释去景帝大半的猜忌心。再者问其何故当初推却宴席，卫绾则坚称当初实病，至景帝不疑有他。此处着实凶险，稍有应对不得，则卫绾早已人头落地。接着景帝赐剑之事，卫绾皆应答得体，深得君心。可见其并非只有醇谨，更深懂捉摸君王之好恶。

## （二）直不疑

塞侯直不疑，为文帝时郎官。对于直不疑的虚伪，传文中突出之处有以下几点：

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称为长者。（〔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70）

直不疑被怀疑偷金子，含冤而不辨，竟自认错还买金偿还。这举动不但不合人情，且有沽名钓誉之嫌。盖直不疑应当知道是同舍告归者误持金子，然他仍然假意认错而买金偿还，盖知此事将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故投机以待回报之日。再者就是朝廷有人诋毁不疑与嫂子有染，但他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句“我乃无兄”，此虽可看作不疑豁达，不因名声而和人争辩。然而前车可鉴，既然偷金一事看得出直不疑乃欺世盗名之徒，则于盗嫂一事，又何尝不能依样画葫芦？至于传文总结直不疑的行迹：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71）

《老子》第三十六章有言：“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陈鼓应，2009，页198）老子思想素有“正言若反”之说，虽其主旨在于强调事物的对立面是相反相成的统一性，但其欲擒故纵处却常受到诟病。《万石张叔列传》先记直不疑学老子思想，后言其“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却反被人“称为长者”，隐然有暗讽他歪曲黄老之术，欲擒故纵而博得长者名声，故有学者谓：“直不疑买金偿亡，不辨盗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诟受诬，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陈仁锡著，张大可主编，2005，页452）

### （三）周仁

周仁者，以善医术而见于天子，于景帝时官拜郎中令。周仁之所以能得幸兼进出宫中近于宦官，因其“阴重不泄，常衣敝补衣溺袴，期为不絮清。”此句当解之为：

阴密也，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类也。其人又常衣敝补衣及溺袴。故为不洁清之服，是以得幸入卧内也。（王骏图、王骏观，1979，页374-375）

是以周仁能得幸，乃因其能“不泄人言”，能守密，且常故意穿着不洁净之装，后宫皆不喜接近他，故得以进出宫中近于宦官。以此看来，周仁是有意穿着不整洁，以便得到特殊宠恩使能自由进出后宫，以致“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可见周仁的谋略得逞，景帝亦因其之“不泄人言”，而乐于让他呆在自己身边。

类似周仁这种有预谋使弄权术者，司马迁是应大加挞伐的。然而周仁之所以能得宠，乃因其之能“不泄人言”，其后所能褒扬之处，亦是他的“不泄人言”。景帝常问朝臣状况于周仁，周仁皆曰：“上自察之。”同时他亦没有诋毁任何人。对于这点，周仁又胜于一些搬弄是非，对同僚落井下石的佞臣，而且他常辞让不肯接受皇帝所赐之物，于诸侯群臣之间的贿赂，亦坚决不收。或许基于此点，他才能立于此传，不至于沦落至《佞幸列传》了。

### （四）张欧

张欧者，于孝文帝之时，以治刑名从侍太子。景帝当位后，张欧官拜九卿，后又晋升为御史大夫。张欧虽擅长刑名之法，但自从他任官以来，从未以刑法治人之罪，而是以诚恳忠厚的态度当官。这样的人格本是值得赞许的，然而《万石张叔列传》乃是讽刺那些凡事讲求明哲保身至庸碌无为的庸宦，何以司马迁将张欧置于此传？观传文有曰：

然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对而封之。其爱人如此。（〔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驷集解，1982，页2773）

张欧虽擅刑名之法，但在其当官的生涯中却不曾以法惩办别人，而专门以诚恳忠厚待人。每当有判定的案件需要呈予天子批准，张欧却尽量把案件退回重审，不能退回重审的，则表现出一副万不得已的模样，流着眼泪亲自看着文书封起来。这里有两个字眼需要注意，那就是“专以诚长者处官”的“专”，及“为涕泣面对而封之”的“为”。专者，除了有专心、专长之意外，尚有独占或独断之意，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曰：“专禄以周旋，戮也。”或是《左传·桓公十五年》曰：“祭仲专，郑伯患之。”若是一般行文的情况下，欲形容一个人的

惯常行为时都会用“常”，司马迁于此处用上“专”字，盖有其深意，或乃在于突出张欧“特意”以诚长者处官的态度。诚若此，所谓长者云云，都只不过是为官的一种门面功夫而已。以此观其下文，则“为涕泣面对而封之”更显张欧的虚伪处。

身负职务，且擅治刑名之法，张欧非但没有在其位尽其职，还屡屡恣意将已判定的案子退回重审，更甚者面对无法退回的案子流泪封之。为者，人为也，司马迁在“不可者，不得已”之后用上“为”字，可见张欧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涕泣状力保其长者名声，那虚伪造作、“务在鞠躬”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通过前后文对比，不难发现司马迁貌似赞扬张欧，实则笔笔皆是暗喻讽刺。故此，司马迁以“其爱人如此”作结，将暗讽之笔表现得妙到巅毫，仿似在为读者作注释，深怕后世误解其立《万石张叔列传》的真正用意。

#### 四、立传旨意

前言提及，太史公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身受极刑。当时他因家境清贫无钱自赎，然而却“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对此宦场人情之冷暖，世态之炎凉，他已尝尽个中的酸甜苦辣。以这般人生经历，来写《万石张叔列传》，换作是俗人之笔，或早已直斥其非，笔刺力透纸背了。然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言道：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宋〕裴骃集解，1982，页3299）

司马迁撰《史记》，为的是继承《春秋》而“士贤能而用，主上明圣而德布闻”，非独要讥刺或褒贬那么简单。论其时汉廷虽不少如本传之人物般，为官但求四平八稳，恭敬维诺，揣摩人主而趋好避恶者。然而，他们虽然无功但亦无过。论残酷不仁，他们不如酷吏；论谄媚奉上，他们不如佞幸。为此，若于史册直接对他们大加挞伐，未免有失公允，故以大义藏于字里行间，留待后世者自行辨晓，引以为鉴。传中讽刺之事，若石奋过宫门阙而下车、见辂马而轼之、燕居而冠、朝服而见；若直不疑之买金偿亡；若张欧之不言案人而以诚长者处官等，都是表面写各人之美善德行，或以生花妙笔写各人一些看似无关痛痒的小动作，又或是通篇皆见之“无所学”、“无所言”、“无所用”等，实则细心读起来，均可发现内里蕴含讽刺之意。这些，都是司马迁之微言大义，以明“贤贤贱不肖”也。

吴师福助于其著作《史记题解》中，扼要评点《万石张叔列传》，其言：

史公之文大抵以跌宕胜，此传行文严谨，少灵动之气，一似所传诸人之性行，史公之才盖无所不可也。传中多处细节描写，生动刻画人物微妙心理，讽刺技巧尤其出色引人。（吴福助，2012，页194）

此见解确是一语中的。诗句有所谓“诗眼”，若文亦有所谓“文眼”，本传之“文眼”必在于“谨”之一字，而此“谨”字与本文主题“务在鞠躬”同义。传中各人皆“谨”，若石奋之恭谨；石建之孝谨；石庆之审谨；卫绾之醇谨等。从这几个不断出现的“谨”字来看，《万石张叔列传》在不经意间已勾勒出整个汉廷的氛围，即统治者的专横，致使当官者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韩兆琦《史记题评》谓：

朝臣们“恭谨”乃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恭谨”的背后隐藏着对汉武帝严刑峻法的恐惧心理。……专制主义对人的压迫就表现在它威胁、诱惑人成为非人、剥夺人的思想，把人变成驯顺的奴隶，这是本篇所表达的对封建专制主义本质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韩兆琦，2005，页299）

的确，石奋等人之无学，故其必以恭谨醇谨仕宦。然而对统治者来说，无学才不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权威）。在乱世，或许当位者都需要王佐之才来辅弼自己匡正天下。然而到了太平之世，他们需要的是个人的权力集中，太聪明能干的下属，反而就不是他们所喜爱的了。在君主的角度来看，他们喜欢平庸的臣下乃源自一人专制政治的猜防心理；在臣下的角度来看，封建皇权的专制政治常扼制了人的天性的发展，积久成弊造就了官场大部分官宦的双重人格及价值观，在信誓旦旦表示对君主国家效忠的同时，也效忠于个人的利益而甬顾国家兴亡。这种双重人格及价值观的官宦，即为本文中只懂恭谨维诺当官，对大是大非却知而不言的庸宦。<sup>8</sup>

司马迁处于如此一个大时代背景下，以其撰史的志向乃为“继《春秋》，拨乱世反之正”来看，他绝不会受到统治者及同侪们的喜爱。因此，司马迁在武帝朝廷之中显得格格不入，然为了苟延残喘以留下性命完成《史记》一书，其内心的挣扎拉扯又是那么的剧烈与伤痛。一直到任少卿捎信来要他代为向武帝求情，而司马迁为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而选择了沉默。自从他身受腐刑，决定留下命来完成《史记》的那一刻，他已决定不再多管朝廷的闲事，而选择了随波逐流。

## 五、结论

当初司马迁抱持忠义之心为李陵进言，结果落得身心俱残之境。当他身陷囹圄时，心中大抵也希望有个知交能像自己为李陵般挺身而出，就算最终不成事，至少在心灵上还是有所慰藉的。可惜世态炎凉，朝廷里多是“务在鞠躬”之徒，尽是唯唯诺诺、只懂揣摩主上心意行事的庸宦。在尝尽人情冷暖之后，化悲愤为

<sup>8</sup> 当然也有官吏并非双重人格及价值观，他们或重义或重利，在历史上或受褒或受贬，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官场上占大部分的仍是双重人格及价值观的庸宦。见李法宝、米万英、洪润泽，《官吏、官制、官文化及历史走向》，页23。

动力的司马迁背负历史的使命撰写《史记》，其中的《万石张叔列传》，就是对这些“务在鞠躬”的庸宦所作出的历史审判。而在司马迁的文学妙笔之下，其用讽刺手法所刻画的庸宦形象立体突出。读着二千年前成文的《万石张叔列传》，却仿似看着现今的政治新闻一般，那些“务在鞠躬”的行为，恰恰与现今政治界的一些跳梁小丑相吻合。可见太史公的史观之远长、文学之深厚，在写人物的同时竟连人性的刻画也超越了时空。

### 参考书目

- (汉)司马迁撰, (唐)司马贞索引, (唐)张守节正义, (宋)裴驷集解(1982)。《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 (汉)司马迁撰, [日]泷川龟太郎考证(1982)。《史记会注考证》。台北:中新书局。
-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196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1992)。《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台北:里仁书局。
- 杨燕起、陈克青、赖长阳汇辑, 张大可等主编(2005)。《史记研究集成》第六卷《史记集评》。北京:华文出版社。
- 韩兆琦、张大可、宋嗣廉著, 张大可等主编(2005)。《史记研究集成》第三卷《史记题评与咏史记人物诗》。北京:华文出版社。
- 王明信、可永雪著, 张大可等主编(2005)。《史记研究集成》第七卷《史记人物与事件》。北京:华文出版社。
- 吴福助著(2012)。《史记题解》。台北:国家出版社。
- 徐文珊著(1980)。《史记评介》。台北:维新书局。
- 王骏图、王骏观著(1979)。《史记旧注评议》。台北:正中书局。
- 陈鼓应著(2009)。《老子注释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
- 李法宝、米万英、洪润泽著(1989)。《官吏、官制、官文化及历史走向》。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
- 徐复观著(1970)。《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 收录于《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三辑第二册。台北:大陆杂志社。